

柯 岩



癌症 ≠ 死亡

AI ZHENG ≠ SI WANG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癌症 ≠ 死亡



责任编辑：曹礼尧

封面设计：韩美林

版面设计：李 璇

书名 癌症≠死亡

作者 柯 岩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

1987年9月第一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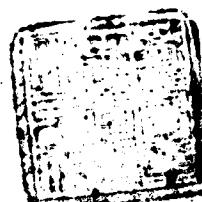
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.75

印数 1—4,950 册 字数 219 千

ISBN7-5411-0105-2/I·104

统一书号：10374·420

定 价：1.96元



1987.9.10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32824



又见蔗林，又见蔗林

又见蔗林，又见蔗林，
如对故人，如对故人！
山川，山川，
曾记否？记否
当年，你我三人
追随将军万里行……

一路同行，啊，一路同行，
一路歌声与笑声，
豪情满怀，壮志凌云！
今日青年，恐难信
我们也曾青春年少，
青春年少，一如他们！

一路同行，啊，一路同行！
诗意图然，热血沸腾，
司令员，指点江山：
.....

柯岩，现在的报告文学作家，
当年的.....

1132824

目 录

希望在哪里	1
从一个孩子看中国	21
癌症≠死亡	45
青年经理	94
葡萄承认	130
我把他介绍给你	155
烟台，有家丝织厂	180
女人的魅力	207
十五的月亮	241
国画大师李可染	268

希望在哪里

我在北京朝阳区工读学校深入生活，为我的小说补充一点材料。只要有可能，我就要找他们的支部书记兼校长刘瑞峰谈上半天。当然，是谈学校，谈教育与再教育，但学校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因此必然地，我们也会谈到社会、家庭、工厂和农村。谈我们的希望与忧虑，欢乐和苦恼，焦灼甚至是愤懑……

因为刘瑞峰又是我二十多年前一道“救过火”的同志，谈话不可避免地就要涉及到他这些年的遭遇和经历。只要一到这种时候，他就会关上录音机，并要求我停下笔来。我虽然很不愿意，但因为尊重他，也只得照办。

他是个虎虎有生气的人，谈起话来热情奔放、慷慨激昂，却又生动活泼、极为深沉与细腻。我常常开玩笑地称之为“说书”。经常是在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，我走到他那里，坐下说：“怎么样，来一段”？这时，不管他正在干什么，多半是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笑着说“好，来一段就来一段。”他的话就象湍急的河流：忽而清澈见底忽而浊浪滔滔，忽而奔腾飞越，忽而漩涡四起……我常常听得入迷。

这一天，“段子”正说到热闹处，突然他说：“这些，你就不用记了，这与学校无关。”看我仍手不停笔地记，他停了下来，两只眼睛狐疑地打量着我：“你，不是写小说吗？”

“是写小说。”我正正经经地回答说：“写小说的都需要，请往下谈吧。”

“不，不对。”他忽然走近我，用手拍着我的本子：“哎！我说——你可千万别把我写进你的报告文学里去呵！”

看着他机敏而决断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就算写个报告文学，又有什么不可以？你紧张什么？”

“呃，别，别！可千万别写我呀！”他忽然手足无措起来。看出我丝毫没有听从的样子，他生气了：“你怎么这样？”

“什么样？”我忍住笑反问他。

“以后和你谈话可得多加小心了，人家拿你当老朋友……”他无可奈何地用手搔着头，十分懊恼地坐了回去。

看着这个一向惯于发号施令、信心十足的人，忽然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，我惊奇起来：“你怎么了？我写好后一定请你过目，还不行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不是不信任你。我是说，我有什么可写的呢？我只是一个，一个普通的党员。”

是的，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员，做着一个普通党员应该做的一切。但是，在经历了那个极不普通的时代，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及其追随者把我们的党糟蹋得不成样子，党内也逐渐出现一些特殊党员，及涌进许多不合格的党员的时刻，在成千上万对我们党并不了解，却奢谈什么“信仰危机”的青年面前，这个普通党员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地令人激动啊！不，我不能听从他

的意见！我一定要记录下这个普通党员的故事。

他怎样管“闲事”

刘瑞峰的学生可能很难相信，对他们从不发怒的校长会在街上和人吵架。但这样的事确实不止一次地发生过，有时是在公共汽车上，当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欺负姑娘，或是挤倒老大娘的时候；有时是为校办工厂去求活儿，而给活儿的单位变方设法索取“礼物”的时候……这里，我只讲一桩完全与他无关、真正是毫不沾边的“闲事”。

那还是去年初冬，刘瑞峰陪女儿去买棉袄。他已答应过她多次了，可老是没有时间。这次非去不可了，因为天气已经冷得不能再冷了。女儿对他气很大，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棉衣，首先是为了去年没考上大学。别的孩子都有爸爸给找补课老师。她的爸爸，就在学校当领导，工读学校里好老师多着呢！可爸爸就是不找：“影响不好”。好，不找！那您给讲讲吧？又不行，没工夫！“好孩子，你先自己温，下趟回家一定给你讲。”可一趟又一趟，回家自行车一摆，不是去找老师商量工作，就是上学生家去“家访”。一个学期都快过去了，还没讲过一次呢！因此，这次陪女儿去买棉衣，在老刘是带点赔情的性质；而在女儿，却并不很领情。

到了商场，好不容易挤到柜台跟前，售货员聊天聊得正热闹呢。女儿很快挑好了样式，回头征求爸爸意见。一看，爸爸两眼正直瞪瞪地看着另外的柜台。原来，那边，两个售货员正在吵架。姑娘在柜台里，小伙子在柜台外。小伙子要姑娘给他拿件热门货，姑娘就是不理。

“劳驾，把你留的那种外转内销的衬衫匀给我一件。”小伙子说：“哎，怎么不理人哪……不就是昨天那带金线的袜子没给你留吗？得，敬礼！下次一定注意。”

姑娘仰着脸嗑瓜子儿。

“耳朵聋啦！”小伙子来了气。

“你瞎啦！没看见我正忙着。”

“得，忙完了给来一件。”

“给你？看你那德性！穿上也没人样儿。”

“怎么骂人？公报私仇，什么玩意儿？！”

“你玩意儿好，你——

“你他妈的，别让我把脏事抖出来！”

“你他妈的，我连你妈一块抖！”

你妈，她妈；他妈的姥姥，姥姥她妈……越骂越升级，脏话象阴沟翻了底，浊浪滚滚，臭气熏天，越来越不堪入耳。奇怪的是，商场连领导带售货员，都熟视无睹，没一个出来制止的。

女儿十分担心地看着爸爸，一把没拉住，刘瑞峰一个箭步跳了出去，一拳头砸在边上一只空货箱上，面红耳赤地大嚷起来：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！你们——你们还文明经商呢？！你们——你们不怕污染了空气……”

“管得着吗！”姑娘嚷道。

“管得着吗！”小伙子恶狠狠地扑了过来。这会儿，他们又进入一个战壕了。没想到的是这位半大小老头儿一步也没后退：

“就是要管。还非管不可！你们领导呢？叫你们领导来！”

刘瑞峰简直是咆哮了起来。周围的顾客早就憋着气，见有人挑头，也纷纷斥责起来：“不象话，太不象话了！”“这要搁从前……”组长找来了经理……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了下去。

但刘瑞峰还不走，还在意见本上写意见。女儿赶紧拉走了爸爸。

棉袄当然又没买成，刘瑞峰很抱歉。没想到女儿撅着的嘴却笑成了一朵花：“爸爸，幸亏您一年就上这么一趟商场。您哪儿来的那么大气？！”

“我气的是没人管，五十年代那会儿……”

“别五十年代了！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怕您？”

“他们不象话嘛！”

“得了吧！”女儿扑嗤一笑：“他们哪，看您那么大气派，八成儿，把您当成上级来私访的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刘瑞峰愣了一下，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可以后，以后会全改过来的。一定会的，你要有信心。这不，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嘛……”

女儿听着父亲的教训，默默地和父亲比齐了脚步。她的怨气消了不少：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嘛！不是所有的女儿都有这样的父亲的。

她忽然紧紧挽住了爸爸的胳膊。棉袄么？以后自己再找个地方去买；功课么？当然是，自己加劲儿努力去温呗——唉！

他怎样“发号施令”

刘瑞峰在学校里还真有权威。往往在激烈的争论或是完成一件任务之后，主任、老师们会情不自禁地说：“还是咱们书

记对呀！没的说。”

怎么个没的说呢？多着哩！就随便讲几件吧：

刚开学时，校舍可破烂呢。“自己动手修。”书记说，“还得间间明亮，室室有花。咱们这些孩子没过过文明生活，得先从美化环境开始……”

“自己动手？”今天回述的老师笑了，“要知道那是1978年。刚粉碎‘四人帮’一年多，那会儿，人们还习惯于光动嘴哩。可书记抡镐就干起来了，咋办呢？干呗！没的说。”

刚修好校舍，书记又要给学生修操场。哪儿有地方啊！老房子留下的，遍地是猪圈。没地方不行，书记第三周就得让学生赛跑……

“这怕不行吧？”一向熟悉“工读速度”的我，也不禁迟疑起来。

“咋不行？让猪圈搬家！书记抄起锹，把鞋袜一扒，就跳到猪圈里起开粪了。”体育老师皱着鼻子笑，好象今天还嗅得见那猪粪的冲天臭气，“干呗，‘没的说’呀！”

工读，工读，得赶快盖校办工厂。可盖冲床车间那会儿，工程进展慢腾腾的。为什么？没人抹顶。等办公的人来找书记，一看，书记正在房顶上抹灰呢。一身泥一身水的……咋办哩？大伙儿上呗！“没的说呀！”

刚归置得有个眉目，书记又来招儿了：“光物质生活可不行，还要精神生活：得组织剧团，合唱团，让学生朗诵诗……”教师会议笑成了一锅粥。“就这学生，还朗诵诗？别逗了！”可刘瑞峰又开始发号施令了：“学生不会？咱老师会。来，每人一首，我带头。”给我讲这事的语文教员杨春山笑着说：“顿时就给我下了一道令，你不是爱诗吗？来，开讲！给大伙儿讲

讲，诗是什么？怎样作诗？差点没吓破我的胆。可咱书记那是军令如山倒哇。您猜怎么着？还真成了。书记第二天就交了一首叫《工读校旗》。音乐老师也来了情绪，给谱了曲。这不，现在还是保留节目呢……”结论当然又是：“没的说哇！”

老师们都纷纷交了稿，给学生开了个朗诵会。说惯了粗话，从没听过轻声细语的学生们却说：“哟，老师！你们怎么都这么说话？这就叫诗吗？我怎么脊梁上直发麻。”

可美感是需要培养，也是可以培养的。现在朝阳工读学校不但有了诗歌组，还有了摄影组、雕塑组、合唱队、师生小乐队、话剧团。去年两周年校庆时不但唱了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工读校旗》、台湾校园歌曲《小路》，还自编自演了不少节目哩。这里我只节录其中的一首诗：

我没有写过诗，
我的手从不干那样的事；
虽然这也是一双人的手呵，
但野蛮和贪婪已把它侵蚀。

我曾是那样愚昧，
以致不识斗大的字。
魔鬼抽去了我智慧的神经，
让聪敏的心变得如此原始。

（以下是一些描写工读生活的段落）

……于是，我写下了这首诗，

既不押韵，还有错别字。
但诗里却有了一个崭新的影子，
一串串热泪打湿了雪白的纸……

青春呵，你是那样美好。
为什么，我以前不把你珍惜？
我相信，会有那么一天，
我的青春会谱写出更美的诗句。

在有的人看来，这也许不能算一首真正的诗。但要知道，这是从把那些酗酒、赌博、偷窃、斗殴、野蛮、原始、不骂娘就不会说话的孩子，变成讲文明、守纪律、有理想的人的学校里写出来、朗诵出来的呵！我不知道读者会怎样感觉？我是流着泪听那位女生朗诵的。我的感觉当然是发自衷心的“没的说”！

一般学校老师的生活是清苦的，而朝阳工读学校的老师则更苦。什么八小时以外，他们不懂这个。和学生一样，他们住在学校里。白天给他们上课，制止一切流氓行为，培养文明生活习惯；夜里还要值班、守夜，给学生盖被子……因为学校是特殊学校，因此工读老师得钻研特殊的教学本领，而且还得年轻力壮的。对工作，他们是壮丁。对家庭呢？他们大都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也是壮丁。我就亲眼看见过多次，有的老师很不好意思地来找老刘。因为孩子、老人病了，或是家里没人拉煤、装炉子：“想请一晚上假，明天一早赶回来，绝不影响上课。”要知道，学校离城区几十里，这“赶”字可真是绝不夸张，无需形容。

这些，在战争年代，甚至五十年代，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。但现在……没有一点精神力量的人能办到么？这支部书记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？

“书记比谁都累，所以……”一个教师说。

“书记要求高。一忙，也就忘了自己的事了。”又一个教师说。

“我们不是混事由儿，我们是在干事业。”说的人神色郑重。

“你不知道吧？现在北京这么些工读，好象……我们这个……还可以，嘻……”说得自豪又忸怩。

大多数教师和工人都对我说：“您一定看得出来，咱们这儿正，没那些歪的斜的。一正，心里就痛快，再苦再累也就不算事儿了。”

是呵，我确实看出来了：他们有一个多么好的教师集体呵！革命的责任感和集体的荣誉心，使得他们每个人都全力以赴，你追我赶。为集体想得越多，为个人争长道短的事就越少。食堂没办好，书记去找一个党员，二话没说，进了食堂拴上钥匙就当上了管理员。汇报演出，老师学生，谁合适谁上。新编的话剧里差一个妈妈，编导指定要说天津话的。于是，书记去请一个炊事员，解下围裙，就上了排演场……

“你怎么指挥得动呢？”想着那些“大象屁股推不动”的单位，我一次次羡慕地问。

“主要是同志们觉悟高，经过十年动乱，明辨是非的能力强呵！”刘瑞峰每次都这样回答：“其实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火，咱们的工作就是点燃它，千方百计地点燃它……”

难怪大多数教师、工人总是笑着对我说：“也不知怎么搞

的，跟我们书记一块干，没的说，真是越干越会干，越干越想干呐！”

他怎样成为权威

能使人越干越会干，越干越想干的人，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行家，二是组织家。

刘瑞峰办工读是行家，这是校内外一致公认的。如何点燃学生心灵火花的故事，我在《特邀代表》里讲过一些，以后还要专门讲。这里，只说个笑话吧。

十年浩劫，刘瑞峰是当然的“走资派。”可妙在他隔离，大多数老师也就不干了。学生放了羊，弄得造反派不敢出门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异的景象：常常是造反派气急败坏地来找刘瑞峰：“流氓头，出来管管你的小流氓。”而这时，刘瑞峰总是先整整衣帽，然后才出来发号施令。不管给他戴什么帽子，挂什么牌子，在大多数学生心里，他庄严的形象不变。

当然，这庄严首先是在刘瑞峰心里。他在小屋里每天沉思，他越来越明白自己没有违背毛泽东思想。那么，世界变得这样颠倒，责任当然就不在他身上。

人，最怕的是自我矛盾和丧失信念。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是任何人也打不倒的。因此，刘瑞峰虽然一会儿挨斗，一会儿养猪……但就象造反派骂他的那样：仍然是“神气活现，架子不倒。”

不但架子不倒，还经常不断地和头头们开点玩笑。比如说，一次，要押解他进城批斗。他庄严宣称：“我是共产党员。你们造反，声称是为共产党好，那么，押解共产党员，岂

不就把自己放到一个不美妙的位置上了？是否咱们各走各的，到时保证不误你们批斗。如何？”我想，读者们都会了解那时是会“如何”的？一顿触及皮肉之后，仍然押解上路。

路是漫长的。既然要造反，就得保住“革命本钱”，造反派要在中途用饭了。一进小饭铺，刘瑞峰就笑嘻嘻地向掌柜的打听各种面的价格。一边啧啧称赞着要了两碗面，一边买了两个烧饼揣在怀里。造反派一看，“走资派”很老实，于是要菜的要菜，要饭的要饭，还吩咐跑堂的：先给革命的上菜，后给反革命的上面。这在那时是界限分明的，跑堂的当然也不敢站错立场。但谁也没想到：正当造反派埋头饭菜时，刘瑞峰撒腿就跑了。造反派大骂：“他妈的，你敢颠老子！追！追！！”却没有一个动窝的。为什么？刘瑞峰说得好：“我太了解这帮人了，既要靠‘造反’起家，打、砸、抢还来不及呢！哪里肯委屈了自己的肚子，亏了自己的钱包……而一个共产党员，命都可以舍出去，还在乎两碗面？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，”每个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都开怀大笑。

“哈哈哈哈，”每个听这个故事的人也都前仰后合。

当然，那天按时到场接受批斗的刘瑞峰是笑不出来的。因为场内大多数是受蒙蔽的群众，他得正确对待群众和自己。他既然耍弄了那帮造反派，得到了不被押解的精神胜利，那么，肉体上的大大惨败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。

了解人、研究人、分析情况，具有战略眼光而又不失战机，这是刘瑞峰办工读的看家本事。至于从“解差”手中开溜的这个具体战术，则是从他的第一批学生，旧社会的流浪儿如何对付国民党警察那里学来的。

“哈哈哈哈，”刘瑞峰今天听我向他核对这段事实时也大

笑了：“你连这个也听说了？那你当然知道，以后他们是怎样整我的了？”

我点点头。确实造反派也真没法子不讨厌这个“架子不倒”的家伙，于是在1969年彻底砸烂工读时，就把他发配到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。公社在县的最边缘，卫生院是当时最乱的单位，叫你刘瑞峰到那儿好好地受用去吧！

他到了没几天，就出了一档子事。

一个有四个孩子的重病号，痰堵了嗓子，护士要求抽痰，可值班的头头（那会儿，谁都会看病）却说：“听你们的？听我的！”值班时竟吃饭去了。明明不该死的，却生生一口气上不来，死了。贫下中农早就深埋着的怒火爆发了，拿着棍棒镐锨，来找这个头头算帐，吓得他直哆嗦，满院子乱跑……

我说：“该，该！该着教训教训他！”

刘峰瑞说：“不行哇，那还不打死了。他是有罪，可罪不当死呵！”于是老刘挺身而出：“乡亲们，婶子大爷们！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！容我们个功夫，我们一定妥善处理……”

结果呢？对乡亲们，是妥善处理了。可头头呢？仍然是头头。人家上头有大头头护着呢！

“就该让群众教训他，谁让你管这闲事的。”我埋怨他。

“是呵，从感情上说，我恨不得揍他。可群众会怎么看我们党呢？党员不出头，书记也不出头？”

“那你出头了，群众怎么看？”

“群众以后有事就找我，什么话都肯和我谈。”

去了没几个月，他就把这个卫生院整顿得头是头，脸是脸的。贫下中农拿他这个有“罪”的流放者当亲人看。他该老老实待着了吧？！